

世變之亟——由中研院文哲所 「世變中的文學世界」主題計畫 談晚明晚清研究

27-24

Extremes of Historical Transitions — A Discussion on Late Ming / Late Qing
Research under the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s "Historical Transitions and Literary Worlds" Project

胡 曉 眞 (Siao-chen Hu)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明清兩代由於與現代中國／中國現代化皆有緊密的關係，再加上資料與文物的保存遠較前朝完整，故在當前的文史學界，是極重要的研究領域。而晚明與晚清這兩個時期，是近世中國的關鍵轉折期，在明清研究中更具有樞紐意義。筆者於本文中，藉由討論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之「世變中的文學世界」主題計畫的研究成果，略談晚明與晚清研究與當代文化的關係，以及其未來的研究展望。

壹◎緣起與思考

中研院中國文哲所自 1998 年 8 月至 2000 年 7 月執行「世變中的文學世界」主題計畫¹。計畫的緣起，乃希望集合學者共同思考古典文學研究如何在世紀轉換的時期重新出發，於是決定以「世變」為主軸，探究文學與歷史、社會、政治的輻輳關係。計畫的重點，則在處

理世變中的文人心境、文學創作、文學詮釋、文化生產、與文化傳播等問題。在中國歷史上層巒迭起的變局中，我們選擇了四個重大世變時期，即魏晉南北朝、唐宋之際（以晚唐五代為中心）、晚明與晚清。我們以座談會的方式開發議題，同時以刊物專輯呈現各種意見的交錯激盪，最後則以研討會的形式，匯集相關學者發表論文，並出版論文集，作為計畫的總結成果。此一主題計畫除了有其縱觀的歷史及文學史視野之外，其中有關晚明與晚清的部分，更有並列探討的必要。筆者擬在本文中介紹「世變中的文學世界」計畫中晚明與晚清的部分，一方面呈現計畫執行的成果，一方面則希望突顯其與整體明清研究的關係。

面對晚清的變局，嚴復曾慨嘆「嗚呼！觀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並深惜中國有識之士，「待今日而始知其危」²。時危國難，知識分子應當奮起救亡圖存、力挽狂瀾，這可說是晚清所有政治與

1 本計畫由文哲所三位研究人員共同主持，分別為：胡曉眞（文哲所副研究員）、衣若芬（文哲所副研究員）、劉苑如（文哲所助理研究員）。

2 嚴復，〈論世變之亟〉，《嚴復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1。



文化論述的共識。這種強烈的變局意識，自晚清以來，一直未曾或減。姑不論二十世紀初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爲了在家國危難中尋求現代化的可能，往往不惜採取決裂的手段，就是到了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兩岸的中國人仍舊各自認爲身處亂世，苦於如何弭亂治平，進而與世界並肩齊頭。或者真的由於百年苦難未曾或歇，從晚清到當代，雖然已幾經人世變換，但末代危機與變局意識，卻未必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衰。

而有趣的是，晚清人痛思國家大廈將傾，往往回顧晚明的駭人亂象；而五四人嚮往現代化的美麗遠景，卻也一再回味晚明的絢爛光彩。到了甫經世紀交替的今日，中國在政治、社會、文化等各方面都仍處在晚清以至五四的餘音迴盪中，而晚明的光環遂也經由一個「折照」³的過程，奇異地盤旋不去。當然，從明末到清初，庶民經歷戰亂殘殺、流離顛沛；文人體味易代之痛、黍離之悲，更面臨生死仕隱的抉擇，其身體的創傷與心靈的掙扎，在在皆有記錄。而晚清知識分子夾處於內憂外患之中，撫今追昔，回思明朝覆亡經驗，其感懷的心情自然可以理解。迨民國建立之後，五四知識分子追求「現代」與「進步」、「開放」與「自由」，渴望脫離傳統的桎梏，則晚明一代風流作爲緬懷的對象，又誰曰不宜？然而，如此簡單清楚的邏輯，似乎仍無法完全解釋何以明清之際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目中，一直保有魔咒一般的魅力？或許晚清的代表人物之一康有爲的觀察可以給我們若干啓示。康有爲在論晚明名將袁崇煥時，有感於明清之際巨變的歷史影響，慨然而發此語：

「嗟夫！明清之際，關於中國亦大矣，非只繫一朝之興亡也。」（康有爲：〈袁督師廟記〉）

誠然，兩千年的改朝換代經驗，即使對歷史感特別強的中國人來說，也已經徒留「幾度夕陽紅」的吁嘆。故明清之際所以在近代及現代中國人心目中持續佔有一席之地，除了時代的接近外，必如康有爲所說，有「非只繫一朝興亡」的理由。正是這些文化、社會、或歷史上的特質，牽繫了近代中國晚明與晚清這兩個世變時期，甚至綰和了世紀交替的當代。這些具有長遠歷史與文化影響的特質，如何指出？是否恆常？有何變異？在明清時期的文化現象中如何展現？又在何種意義上對當代文化反思有所啓發？這些問題正是本計畫的關懷所在。

淺見以爲晚明的獨特魅力，在於其兼具「結束」與

「開始」的詮釋可能性。正因如此，急於反省「結束」之將至的晚清，與切切盼望新文明之「開始」的五四，都能分別在晚明文化中找到自己想要的蛛絲馬跡。歷史現實固然自有規律並且斑斑可考，但是對歷史的論述以及文化、文學、藝術的相關發展軌跡，卻往往有如一部小說、一場大戲，處處洩漏著非「自然」的運作痕跡。任何的歷史詮釋，任憑考證之精、分析之詳，也很難免這種「說故事」或者「情節化」的制約。所以我們現在重新體察晚清以及五四對晚明文化的描述與體會，彷彿目睹一個大故事的構成，其中有真有幻，有因有果，有目的有指向，有開始有結束。如果從敘事學的觀點來看，寫小說，總是先有結果才會有開始。結果不但先於開始，也決定了開始。清初、晚清或五四之看待晚明，其實皆可如此解釋。而我們今日回思晚明與晚清，何嘗不是重新說一個故事？何嘗不夾雜了我們的需要與定見？只是我們對自己的視野，應該多了一分自省的能力。其實，不論「開始」或「結束」，都是有時間展延性的觀念，而非一刀兩斷的節點。人在思考「結束」的時候，必是感受到「結束」來臨的迫切；但更重要且較易爲人忽略的是，思考結束的時候，必然也預見一個開始的到來。人們在理解一段歷史時期的時候，往往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存著開創新時代的目的，所以更要去建構一個結束。這在發生朝代更迭的時代，尤其明顯。當然，每一個朝代在建立之初，就面對了有可能結束的潛在危機，正因如此，所以要一直回顧以前的歷史，確立其結束，也確保自己的開始。明清之際的歷史詮釋與文化論述就是如此。晚明人看當時局勢，已有江河日下的感覺。預見結束即將到來，「有識之士」已經開始批判文化的黑暗面。到了清初，須要開創一個和平的新時代、新盛世，則必然還要再強調晚明所象徵的「結束」、「末」的意義。如果套句流行的術語，那麼可說在急於建立自己主體性的清初以至盛清時期，晚明是被視爲「他者」的。晚明的「結束」特質，在入清以後文人反省明朝覆亡時，一再被痛切描述並批評，因此被塑造成一個結束與沈淪的象徵。

然而，到了晚清乃至五四，情況卻倒轉過來。晚清變成舊與結束的象徵，而爲了開創新的國族與新的文化，必須找一個源頭。此時，晚明突然從一個時代的結束的象徵，變成一個新時代與新文化開端的可能發源

3 有關「折照」的概念以及其與晚明晚清研究的關係乃熊秉真教授的意見，參下文。

地。開始或結束，在時間之流中原來並不一定佔有固定的位置。那麼，在五四新文化論述中成為「舊」與「末」之最典型象徵的晚清文化，是否也還有展現其他面貌的可能性？當前明清研究方興未艾，筆者認為這個問題應該是未來大家共同思索的方向之一。正因如此，在本計畫的設計中，我們嘗試將晚明與晚清並置考慮，而非單獨研究晚明或晚清。誠如上述，我們之所以將晚明與晚清對舉，並非無視於每個時代的獨立性與時代之間的區隔，而是觀察到晚清及五四以來的國族論述與文化反省，每每上溯晚明，一方面以之為亡國之鑑，另一方面，則又視之為啟蒙與現代的源頭、改革與進步的寶藏。於是，知識分子或以晚明亂世作為晚清變局的鏡照，或以晚明文化作為未來的靈感來源。晚明與晚清在這種文化與國族論述的建構之下，已不再只是近代中國兩個重大的歷史時期而已，更是充滿了隱喻力量的歷史寓言；它們一方面昭示舊時代的「結束」，一方面又代表新時代的「開始」。尤可異者，在逢此世紀之交的今日，一股由所謂「世紀末」概念所挑起的焦慮與渴望，似乎又將晚明／晚清的隱喻力量，重新帶入了歷史與文化思考的舞臺。於此可見，不論是在歷史或文學的世界裡，往者未必往矣，而來者永遠保有追之不及的潛力。探討晚明與晚清這兩個歷史變局中的文化現象，或者不只有歷史及文學史上的意義，也有助於吾人面對二十世紀末整體文化生命的歧路徬徨。這樣的思考，可說是「世變中的文學世界」計畫中，將晚明與晚清並置研究的背景。

本計畫執行期間，曾舉辦兩場晚明及晚清相關的座談會，並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刊登兩次晚明及晚清的計畫專輯，收錄相關論文；另舉辦「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並於會後出版論文集。筆者不擬逐項介紹各次活動或專輯的內容，而準備以關連的問題為中心，試圖整理出一些大家共同注意的議題。至於完整的計畫成果，請參考本計畫的專輯系列與論文集（相關資料請參閱本文末）。

貳◎ 議題與發展

在本計畫舉辦的各項學術活動中，與晚明晚清研究相關的重要議題已一一浮現。筆者認為這些都是未來研究的重要趨勢，試以淺見之私，大體歸納並說明如下：

（一）歷史本質的反思

「世變中的文學世界」計畫的原始精神就在重新探索歷史變局與文學藝術之間的錯綜關係，所以有關「歷史」的思考，自然是許多學者共同的焦點。學者們或以宏觀的角度反省「歷史」的概念；或從作品出發，探討文本如何與歷史對應的問題。

首先直接碰觸「歷史」本質問題的，是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熊秉真教授。1999年5月14日本計畫舉行「晚明與晚清文化景觀再探——歷史現實與文學想像」座談會，熊教授以「歷史之幻與文字之真——折照晚清與晚明」為題發表引言。熊教授的出發點，正是晚近文藝理論對歷史研究產生的衝擊。文藝理論帶入了「主體意識」的觀念，使得原本可證而明的「歷史現實」受到質疑，而所謂「營造」的概念則重兵進駐，也造成國族、認同、性別等議題成為研究的新寵。另外，熊教授又提出所謂「折照」的觀念。主觀意識與主體性受到重視後，研究者的眼光就不斷進行著折照，所以今日研究晚清者，乃是基於二十世紀末的立場，而考慮晚明時，更是透過多層的折照才能進行。我們一方面認知到這種學術思潮的趨勢，一方面也必須有所警覺，不可任由今日的眼光完全凌駕於歷史事實之上。熊教授的引言，直指當今文史研究所面臨的挑戰，證諸明清研究的現況，更是啟發良多。特別是「折照」的概念，可以說為「世變中的文學世界」計畫之所以在二十世紀末將晚明與晚清並列思考，做了最佳註腳。

在實際進行文本研究時，歷史的概念也成為思考的中心。例如，中研院文哲所於1999年7月16日至17日，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合辦「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國際研討會，該系系主任王德威教授於會中發表〈歷史與怪獸——《櫟杌閒評》、《櫟杌萃編》、《今櫟杌傳》〉一文，就是牽合了現代、晚明與晚清的文學作品，用以探索歷史想像與現實關懷的問題。本文藉由「歷史」與「怪獸」的共同代名詞「櫟杌」，結合三部不同時代的小說，也嚴肅地思考晚明、晚清以及現代三者之間歷史的關連與文學表現的影響，完整地實踐了「世變與維新」計畫的原始構思。全文以姜貴的反共小說《今櫟杌傳》為本體，首先指出該作在簡單政治意識形態以外具有深刻的歷史關懷，尤其是對惡的體認；繼而延伸討論晚明時事小說《櫟杌閒評》與晚清譴責小說《櫟杌萃編》對邪惡之生成與機制的描述。文學作品一再利用櫟杌的意象，反覆追索歷史的亂象與善惡的辯證，而歷史的意義究竟為何，也在代代文

本的詮釋中，益發顯得曖昧了。全文層層相扣，深度探索了歷史現實與小說傳統中近代中國的一部「怪獸史」的相互指涉。同場會議中，中研院文哲所王璦玲博士發表了〈明末清初歷史劇之歷史意識與視界呈現〉一文。不同於王德威意圖貫穿晚明、晚清與現代作品，從而探究歷史的本質，王璦玲則發揮其對明清戲曲的長才，專注於明末清初的歷史劇。本文認為明末清初由於現實上的易代之變、思潮上的情真理論、以及學術上的務實學風，促成了許多歷史劇的出現。作者認為歷史劇必須敷演重大歷史事件，而大節目皆須有史實依據，且劇作家必須在情節鋪陳間表現自己的歷史詮釋。全文深入探討創作虛實論、審美屬性、視界交融等問題，而對個別作品的分析亦交織其中，全面地研究了明末清初歷史劇的藝術特質。另外，中研院文哲所胡曉真則於「世變中的文學世界」計畫總結學術討論會（2000年6月23日）中，發表〈秩序追求與末世恐懼——由彈詞小說《四雲亭》看晚清上海婦女的時代意識〉一文⁴，以晚清時期的上海為背景，由上海城的興起與彈詞文化的關係出發，試探女性如何藉由文字與時代的變化發生互動。小說借用晚明史實，對晚清政府無能、官員貪劣的指控，以及對民怨、民亂既飽富同情又極度恐懼的心情，在在指向作者本人的歷史認知、現實經歷、以及政治態度，也指陳了晚清女性在各種新興潮流影響下，其觀念與視野出現的重大變化。

這幾篇論文中，王德威運用三個不同時代的文本，一方面突顯其間共同的指涉，一方面剖析其中的變異，從而彰顯歷史本質與善惡道德的弔詭。王璦玲選擇明末清初為處理範圍，運用該時期的數個劇作文本，一方面探討當時歷史劇的特徵，一方面則試圖反省文學與歷史中的虛實問題。胡文意在觀察晚清上海此一特定的歷史時空，所選擇的文本則意在晚清而言在晚明，故其歷史時空處於定點與交錯之間，也間接映照了熊教授所提出的折照概念。歷史本質的問題，雖然不可能在此數篇文章中得到完整處理，但問題本身的嚴肅與複雜，則已昭然若揭，亟待學者進一步的思索。

（二）性別議題的崛起

近一、二十年來性別研究在臺灣學界頗有風起雲湧之勢。稍早，此一風潮不可諱言地乃由外文系的學者所帶起，不過，晚近在漢學研究的領域中，性別意識顯然

也已大大影響了學者的研究眼光。在「世變與維新」研討會中，性別與婦女議題正是許多學者不約而同的關注焦點。此一特色，在大會中也引起了相當的重視。

有關女性與世變的關係，往昔的討論多數著重於描繪婦女在亂世中的受難角色，至於婦女本身對世變的思考及主動參與，或者女性價值在世變中的意義等等，則或者由於資料未被發掘，或者受限於研究者的視角，很少受到重視。本計畫中則有多位學者關懷此一問題，彌補了這項缺憾。例如，中研院文哲所華瑋博士在〈世變中的女聲——傳奇《六月霜》之秋瑾形象及其意涵〉一文中，討論了晚清時期以傳奇雜劇形式對秋瑾的幾種描繪。秋瑾是舉國聞名的女革命家及婦權倡導者，她的事蹟本來就標示了晚清時期女性面對世變，開始有了坐待災難以外的更積極的選擇。然而華文的重心並不在秋瑾本人，而在時人對秋瑾的認識與呈現。該文深入剖析了秋瑾身後出現的幾種戲曲文本，而由該文所舉的例子中，作者發現在眾口一詞的同情聲中，唯有由女性執筆的作品《六月霜》跳脫了男作家對秋瑾愛國精神的單一描繪，進入秋瑾的生命歷程與作為女性的處境，呈現了知識女性在晚清世變中的複雜形象。晚清有秋瑾這樣的「競雄」典範，那麼明清易代之際又如何？哈佛大學的李惠儀教授在〈禍水、薄命、女英雄——作為明亡表徵之清代文學女性群像〉一文中就處理了清代文人如何藉由奇女子形象，寄託自我的自我反省與歷史判斷。而誠如作者指出，這種奇女子形象其實還延伸到晚清知識分子對世變的理解與呈現，再次見證筆者前論晚明與晚清的映照關係。陳圓圓、林四娘等女子在文人筆下，由薄命弱女轉化為女英雄，說明了文人於亂世中的無奈感與文學想像的超越力量。李文探討的雖然是明清之際的人物，其觸角卻延伸到晚清文人對明清之際的借用；華文以秋瑾形象之塑造為焦點，但也以明清婦女的戲曲創作為背景。二文之間的交集，大有讀者進一步追索的餘地。

胡曉真的〈凝滯中的分裂文本——由《夢影緣》再探晚清前期的女性敘事〉與臺大中文系張淑香教授的〈山中傳奇——《老殘遊記》的女性敘寫〉雖然分別處理女性與男性的作品，但都以現實與理想的對比為討論中心。胡文指出《夢影緣》全書旨在對人世現實的厭棄與對永恆仙鄉的追求。該書的女性作者對人事滄桑與時光

4 該文後發表於《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8期（2000年6月），頁89-128。

推移極為畏懼，因而產生存在的荒謬感，轉而以仙山的想像為寄託。本書作於晚清前期，而書中洩漏的對變化與前進的恐懼，恰巧說明了當時的歷史現實——社會與文化皆開始進入劇烈變化的曖昧情況。小說對晚明情教的繼承與篡改，則顯示晚明與晚清的內在聯繫。胡文揭示小說以人世變幻為可厭的現實，以仙山永恆為可欲的理想，代表了小說的晚清前期的特質。而小說對趨近凝滯狀態的穩定秩序的渴求以及對任何變動的焦慮，更指向女性感知變動將至時的深層慾望。同樣以山為理想的象徵，張文處理的則是男性作家藉由神女形象投射的救贖想像。作者追隨小說的發展主線，發現男主人翁所經歷的一系列傳奇女性都與「山」有密切關係。山的意象因此被賦予了神祕文化寶藏的涵意，而山中女仙則代表解救亂世危局的一種選擇。就文學傳統而言，《老殘遊記》改寫了山中女仙的情色神異模式，讓女性轉而綻放前所未有的知性智慧，而山的意象也跳脫修煉尋藥的寓意，而達到人山合一的境界。張淑香認為相對於小說中以公案為主線的敗壞的、父權的現實世界，山中世界以及由女性所象徵的智慧才是作者心目中解救晚清中國危機的唯一法門。如果回思李惠儀的分析，當可得見女性形象在男性作品中，實在具有多樣的寄寓可能。而胡曉真對《夢影緣》中女性焦慮的觀察，如與華瑋對女性創作秋瑾相關戲曲的分析合併觀之，則晚清由鴉片戰爭到二十世紀初這數十年間，女性人生觀的變化不可謂不大，而在此「世變之亟」的期間，社會、文化變遷之巨亦由此可見一斑。

同樣以婦女與世變的關係為焦點，美國維斯聯大學魏愛蓮教授（Ellen Widmer）在研討會中發表“Shan Shili's *Guimao luxing ji* of 1903 in Loc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一文，探討的是1903年閨秀單士釐所作的《癸卯旅行記》。但不同於《老殘遊記》是男作家藉由想像的旅程寄託對晚清國難的感懷，《癸卯旅行記》則是一名婦女實際旅遊的記錄。單士釐是標準的明清才女，也終身服膺傳統閨範。然而，由於丈夫是外交官，單氏得以因緣際會地接觸改革思想與外國文明。因此，單氏對晚清世變的理解，反映了她的出身、性別、婚姻、以及生活觸角的廣度。在遊記中，她表達自己提倡婦女教育的態度，也毫不隱藏身為女性的自己對遊歷的興趣。魏愛蓮也分析了單氏憂心國事的心情，以及對日本富強的欽羨。由外國的經驗反思中國的危局，而出之一女子，這本身就是晚清文化與社會變遷的表徵。

二十世紀初的《癸卯旅行記》及《六月霜》展現女性開始自覺地思考世變與自身定位的問題，那麼男性文人對此新趨勢如何反應？研討會中，中正大學中文系黃錦珠教授的〈論吳趼人小說中的女性觀〉就以晚清小說家的代表人物吳趼人為例，說明男性同樣夾處新舊之間的矛盾。黃文指出吳趼人關心婦女問題，也表態支持女權，但又時時不忘維護傳統婦德。這種游移於開明與保守之間的態度，黃錦珠認為不但是吳趼人個人的心態，更大致代表了晚清當時多數知識分子的女性觀。有趣的是，黃文特別分析了吳趼人小說中對女性遊歷者的描述。吳趼人筆下女性人物的遊歷經驗或者出自被動的避難，或者出自主動的追求，但都顯示婦女拓展生活領域的可能性已漸漸出現，只是遊歷的視野還侷限在個人的情感與婚姻上。揆諸魏愛蓮對單士釐的分析，可以發現像吳趼人這樣的晚清小說家，一方面的確代表晚清女性觀的擺盪特質，一方面則還未體認到當時女性已經有了超出想像的經驗與視界。在晚清這樣一個多變的世界裡，誰說想像一定比現實走得更遠呢？

（三）遺民身影的重現

世變之際、易代之秋，文人處在變與不變的抉擇之間，其心境之苦痛與複雜，當非今人所能完全體會。遺民的行止與作品，必然成為「世變中的文學世界」計畫中的探討議題之一。本計畫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九卷四期發表專輯系列之三，其中即收錄了兩篇與明末清初遺民問題相關的論文。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候選人Dietrich Tschanz以〈由時空觀念論吳偉業的梅村樂府三種〉一文，深究吳梅村三種劇作中的世變意識。他認為從《臨春閣》、《通天臺》到《秣陵春》，吳氏透露出自身對時代的理解，也讓讀者看到了他對清政權從排斥、保留到合作的態度轉化過程。東京大學博士候選人廖肇亨著〈金堡之節義觀與歷史評價探析〉一文，探討明末清初逃禪遺民中飽受爭議的金堡。金堡之所以毀譽集於一身，乃因其行事之風格特異，例如他以佛法先於節義，反對以出家為手段或空談義理，著意於救民倒懸，最後甚至有置「華夷之辨」於不論的言論出現，便引起黃宗羲等遺民的反感。根據廖肇亨的解釋，金堡的節義觀與對時事的關懷，實與其親身經歷的苦難息息相關，更是明末清初文化中一個極為特殊與重要的現象。

事實上，遺民問題的研究還有許多發展的可能性。即以近年的相關著作而論，香港何冠彪教授對明遺民生死抉擇的探討就是重要的例子；對王國維的詮釋也可放



在這個脈絡來談。甚至晚近學界對陳寅恪的興趣，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文化遺民的研究。現代中國已不復有傳統意義的改朝換代，然而，個人尊嚴如何確立、生死仕隱如何抉擇，乃至正統如何延續、文化如何傳承，這些明清遺民的中心問題，經過轉化後，其實仍左右著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命走向。遺民的身影，在未來明清研究的圖譜中，應然佔有重要的地位。

(四) 商業文明、通俗文化與菁英文化

通俗文化的研究儼然已成為當前學術界的顯學之一。中國在明清時期，特別是江南市鎮出現的繁榮經濟，一方面累積了驚人的財富，一方面則促成了印刷業、消費經濟、娛樂事業等等的興起，也使得當時通俗文化的發展達到了高峰。在「世變與維新」會中，也有不少論文以此著眼，由各種角度探索晚明與晚清的商業文明與通俗文化。兩位日本學者——京都大學的金文京教授與東京大學的大木康教授——不約而同地回歸到晚明的社會與文化背景。金文京教授的〈湯賓尹與晚明商業出版〉一文以人物為出發點，思考晚明出版業士商合流的複雜情況。晚明出版業的相關研究很多，但金教授別出一格，藉由一個爭議性的歷史人物湯賓尹，以見當時出版活動的特質。根據金文，湯氏以國子監祭酒的崇高身分，與書商往來密切，正反映了晚明儒商之間的共生關係。這正是晚明社會極重要的特色之一。同時，本文也重新理解湯賓尹其人，對湯氏「東林壓迫者」的歷史定評提出其他思考的可能。大木康教授的〈晚明俗文學興盛的精神背景〉則探索晚明士人的內心活動，藉以解釋俗文學何以受其青睞。本文首先確認晚明戲曲小說等俗文學的中堅支持者正是讀書人，而為了說明文人之所以開始注意俗文學的潛力，大木則創用了「堵塞感」一詞。所謂「堵塞感」，指的是文人發現詩文創作在自己的時代已難以突破的心態。大木甚至認為這種精神狀態是有明一代文人的基本心態，而尤以晚明為甚。金文京由儒賈關係與出版商業看晚明文化的社會背景，大木則由文人精神看晚明文學特色的成因，二者一外一內，分別代表了解晚明文化的兩種途徑。同場會議中，哥倫比亞大學的商偉教授宣讀了〈The Making of the Everyday Worlds: Jin Ping Mei and the Encyclopedias for Daily Use〉一文。該文探討晚明的小說及日用類書如何構造日常世界的景觀。商教授發現日用類書乃由十六世紀末開始流行，訴求於大眾的閱讀習慣，也創造出一個超越地域與階級的話語空間，更進一步影響了小說對日常生

活的呈現。論文同時也指出，晚清大量出現的報刊讀物與各種出版品，其實在某種意義上，也可視作晚明日用類書的一種延續。這三篇論文，分別由文人心態、文人與商場、出版與文化等角度出發，共同勾勒出晚明通俗文化的面貌，以及商業因素在其中發揮的作用。

同時，香港科技大學陳國球教授的〈試論《唐詩歸》的編集、版行及其詩學意義〉一文同樣由對晚明出版文化的關懷出發，探討晚明當時流行的詩選作品如何編選成書，又如何表現了選者的美學價值。陳文認為《唐詩歸》正是編者為了推廣竟陵派詩學而作的，其意在與傳達復古詩論的選本相抗衡。另外，本文也檢視了《詩歸》的各種刻本，發現某些版本的精美形式本身就是吸引讀者的要件，而該書本身配合市民品味的一面，更指出《詩歸》不僅是一個孤高特異的選本，而是晚明雅俗辯證下的產物。由此回思金文京教授的論文，彼此當可互證晚明印刷出版的活躍，以及文人介入商業的情況。

通俗文化與商業文明除了在「世變與維新」會中受到學者矚目之外，在計畫的其他活動中，也是討論的焦點之一。文哲所於 2000 年 1 月 14 日舉辦「世變中的文學世界」第六場系列座談會：「世變中的通俗與雅道——再思晚明與晚清的文化與社會」。會中，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兼所長梁其姿教授即以「財富與雅俗之分在晚明與晚清的關係」為題，發表引言。梁教授認為，雅道文化的建立，源於晚明失意文人在奢華的消費風氣盛行、金錢侵蝕傳統階級制度、社會秩序混亂的威脅之下，失去優勢的領導地位，同時對自己身分的模糊產生焦慮感。為了扭轉劣勢，消解焦慮，於是重新建構一種新的秩序——雅道，以刻意分判雅俗。而文人在建構雅俗標準的同時，除了可以給予自己心靈上的慰藉之外，還可以使自己重新獲得早已在科場、官場耗盡的存活力量。所以雅道文化的建立，是要抗拒當時庸俗奢華的商業文化。簡單的說，雅俗的對比乃是產生於物質豐裕、商業發達的社會。梁教授的這篇引言，可以說是對當前以通俗文化興盛為晚明主要文化特徵的學術眼光，提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平衡觀點。誠然，在財富聚集、消費成習、大眾趣味當道的潮流之外，必有另一種相對的力量。而唯有同時考慮晚明各種力量的折衝、抗衡、與妥協的情況，才能對此一歷史時期的面貌有更為詳實的掌握。

同場座談會中，當時正在東吳大學客座蘇州大學中文系嚴迪昌教授，也以〈申、酉之變前後的文學生態〉為題發表引言。嚴教授的觀察重點在晚明時期的士商關

係，以及士商合流對文化產生的影響。他指出，晚明雅道文化的建立，乃是得利於當時商業文化的激發，由於當時士、商兩者的結合，對文化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士、商結合現象有下列兩種情形：一是文人出身於商人世家，這種出身於世家大族文人由於豐厚的家世背景，對文化起了領導的作用；一是士人與商人往來密切，彼此影響。可見當時雅俗交融並存，呈現出轉化又對立的互動關係。此外，當時的文化、藝術、文學並未因為毀滅性的變動而產生斷絕的現象，主要原因有二：一、科舉文化全面同步提高教育，對文化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二、給予商人參與科考的名額增加，造成士、商結合，與明清文學發展、雅俗互相轉化的關係極大。因此，他強調研究明清文學必須注意當時的地域文化、商賈文化、家族文化，才不至於失之偏頗。嚴教授的取徑與梁教授的觀察看似不同，其實卻有著類似的關懷。回思前述金文京教授的〈湯賓尹與明末商業出版〉一文，更可謂是將此思考方向付諸實際研究的例子。

（五）進口、交換與翻譯

誰都知道晚清文化受到「西風東漸」的影響至鉅。然而西風乘何而來？文化影響的媒介才是最重要的。進口、交換、翻譯這些現象所以是晚清文學與文化研究極重要的部分。甫自美國哈佛大學榮退的韓南教授（Patrick Hanan）是「世變與維新」研討會的特約演講人。韓南教授近年著意於晚清至民初小說，〈Wu Jianren and the Narrator〉一文便是對吳趸人小說藝術的思考。本文開宗明義地點出吳趸人在中國文學轉向現代的過程中的關鍵地位。韓南認為晚清所謂「現代」，指的應是作者對世變必須有所關懷，而且要利用非傳統的文學方式表達其關懷。而吳趸人的小說作品就是最佳的範例。吳氏勇於實驗小說技巧，尤其在時序、結局設計、以及敘事者視角等問題上，更扮演首開風氣的推手角色。本文便以敘事者及視角人物為中心，探討吳趸人幾篇代表性作品。論文對小說敘事分析之細膩，實令人過目難忘。韓南也特別指出吳趸人對西方文明的態度十分複雜，這種態度與他的小說實驗，似乎矛盾，但自有扣樞相關之處。晚清小說研究常易流於簡單的政治、社會或意識型態批判，韓南教授忠於文本的研究取徑與嚴謹清晰的治學態度，無疑為學界立下最好的典範。

吳趸人實驗小說敘事手法，但對西洋小說則抱持反感。相對於此，「世變與維新」會議中，香港中文大學王宏志教授就以〈「以中化西」及「以西化中」——從

翻譯看晚清對西洋小說的接受〉一文，專門探討晚清大盛的翻譯小說。王文認為晚清翻譯小說其實具有創作成分，蓋時人翻譯西洋小說，雖說意在促進中國的改革，但仍借助各種改寫增刪的手法，使作品適合中國所用，於是翻譯小說便成為與原作不同的文本。所謂「以西化中」及「以中化西」，指的就是這種翻譯過程中的雙向運作。本文分析了晚清對翻譯小說的議論與實踐，指出當時翻譯過程中，原作的內容、思想、甚至藝術手法都受到改易，然而這特殊的「接受」狀況，造成了中國讀者對西洋小說的特殊理解，也推動了中國現代小說的特殊發展。本文對翻譯小說的分析與韓南教授對吳趸人小說實驗的討論，剛好呈現了晚清小說界兩種不同的寫作實踐方式，以及面對西潮的態度。

（六）宗教的反思

廖肇亨譯日本荒木見悟教授著〈覺浪道盛初探〉一文，刊載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九卷四期之計畫專輯系列之三，此文雖為荒木教授 1976 年之舊作，但今日讀來，仍頗具啟發性與參考價值。覺浪道盛是明末清初的禪僧，也是方以智之師。文中對於生存於亂世中的「怨」境界、「尊火論」等道盛的思想，做了精闢的分析，也點明了其思想與明末亂局的關係。荒木指出道盛身處亂世，而無末法意識，反而仍舊確信人類促進歷史循環的能力。這是道盛思想與明末四高僧最大的不同，也是其價值值得吾人重估的理由。

中研院文哲所李爽學博士則於 2000 年 6 月 23 日「世變中的文學世界」總結討論會中宣讀〈如來佛的手掌心——試論明末耶穌會證道故事裡的佛教色彩〉一文。李博士對明末耶穌會的活動及相關典籍鑽研極深，他在本文中則著力於明末會士的證道故事與佛經漢譯之間的關係。證道故事與佛經漢譯居然有關係可尋，此一立論本身即引人注目。作者以極為精密的文本比對分析，確切證實證道故事所受漢譯佛經的影響。本文重要的貢獻在於說明明末跨文化與跨宗教的互動與滲透，而其時文化面貌的多元龐雜，遂亦突顯出來。

無庸諱言，或許由於文學研究者訓練的走向使然，宗教的反思在本計畫的研究成果中實屬少數。然而從李、廖兩位先生的討論中，宗教的面向在世變時期的重要性其實已非常清楚。這一方面的思索，筆者以為將是未來晚明與晚清研究（乃至明清研究）極關鍵的發展方向。

（七）俠情的世界

近一年來，由於李安導演的「臥虎藏龍」屢獲國際大獎，中國式的古典俠情世界儼然有了朝向世界與現代的可能性。其實，亂世多英雄兒女，更多文人出於投射心理，對俠士的渴望與想像。「俠」的傳統本是中國文化的重要部分，更是世變時期的關鍵概念。「晚明與晚清文化景觀再探——歷史現實與文學想像」座談會，佛光大學校長龔鵬程教授以「英雄與美人——晚明晚清文化景觀再探」為題發表引言，從「俠」的概念出發，重新檢討晚明文化。龔教授認為學界對晚明文化的了解，過於偏向其頹廢、唯美、或重情的一面，忽略了其充滿俠情、俠義的一面。相對於前代對俠客的褒貶參半，晚明時期的俠客已重塑為正面形象。同時，他也注意到俠義精神之下，男性特質受到極度尊揚，遂直接影響到對女性的態度。俠客對女性或漠視、或排斥、甚至將其妖魔化，又或者將女性轉化為認同俠客精神的女英雄。於是近代文學想像中的女俠與女將，便從晚明文化的氛圍中誕生了，而現實中，也相對出現了許多剛烈英武的女子。龔教授認為這種現象實是晚明時期極當重要的一種文化景觀，最後甚且形成了雌雄同體的女性人格理想。

與此遙相呼應，《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十卷第三期「世變中的文學世界」專輯之四中，北京大學夏曉虹教授發表〈秋瑾北京時期思想研究〉一文，探討近世中國第一俠女的思想形成。夏文揭示秋瑾原本閉處家中，雖然對自身有所不滿，但其嚮往的理想仍是傳統的女性典範，等到她到了北京，才經由與新資訊、新學人士、婦女團體、外國思潮的接觸，徹底轉換其思想。特別是秋瑾對男女平權、婦女教育的立場，在其北京時期即已確立。秋瑾的例子說明了世變時期英雄人格與思想的養成，一方面有其天性本源，一方面則有賴外界刺激。同一專輯中，僑大的楊瑞松教授亦發表〈身體、國家與俠——淺論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身體觀和英雄崇拜〉一文。楊教授在文中仔細爬梳了晚清以來的身體觀與俠崇拜發展的軌跡。誠如作者所言，晚清以來，以身體上的病弱直接聯繫到國族的衰敗，而力主強國必先強種，本是主流的論述。由此而生的尚武論，帶起了對俠的嚮往，而俠的形象也轉化成為國為民的俠之大者。夏曉虹處理的清末女俠與楊瑞松探討的俠文化，其實都是晚清世變時期的特殊社會與文化現象。他們的研究以實例探討了龔鵬程教授提出的俠概念，也指向未來可能的思考方向。

參 ● 後續與展望

晚明與晚清文學藝術的豐富性，絕非本計畫的討論所能窮盡。而文化現象與歷史現實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亦將永遠是學術思考的對象。「世變中的文學世界」整個計畫的籌備、執行乃至研究成果的呈現，正好跨越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的交會。而此一期間臺灣以及全球之政經社會情況，變動不可謂不巨，影響亦必將深遠。「世變中的文學世界」將晚明與晚清並置思考，探討的是中國近代兩次世變中的各種文化現象，但計畫本身亦是世紀交替時期的產物。我們所期待的，應該是引發更多對晚明與晚清文學的探討與論辯，從而刺激對當代中國文化的思考，使之具有更深刻的歷史意識與更寬廣的文化反思。其實，晚明與晚清的探討，還只是「世變中的文學世界」計畫的一部分。吾人對晚明與晚清的思考，如果不奠基在整個歷史流變的認識之上，恐怕也難免管窺蠡測之譏。因此，本計畫的第一部分，亦即魏晉南北朝及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的研究，與晚明晚清的部分並不可截然劃分。值此，筆者願在此稍借篇幅，將本計畫兩個階段的成果列舉出來，以供學者參考：

(一) 論文集：

《世變與創化——漢唐、唐宋轉換期之文藝現象》
(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0年)

《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1年)

(二) 「世變中的文學世界」計畫專輯：

之一《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八卷四期

之二《中國文哲研究通訊》九卷一期

之三《中國文哲研究通訊》九卷四期

之四《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十卷三期

「世變中的文學世界」計畫是中研院文哲所對古典文學之現代詮釋的一次努力，同時也說明了文化與歷史、想像與現實之間永恆的互動與衝擊。在本計畫的構想下，晚明與晚清文化現象的各種發展與變異，一方面與中國歷史上的重大轉換期等量齊觀，一方面則作為近代世變時期的代表，彼此並列參照，並突顯二者與當代文化的關係。「世變中的文學世界」計畫中對晚明與晚清的並置處理，本具有拓展研究領域的企圖，而計畫執行中所開發的各個議題，必然仍能由明清學者群繼續深入探討，使明清研究的園地成果更為豐碩。